

哭瞎了眼睛，隔不久就连病带饿死去了。那时候，其美错姆刚八岁，正好到了朗生开始服劳役的年龄，于是接替了母亲。她开始给谿堆那胖胖的老婆抱孩子，大了，就给谿堆作“羌”（青稞酒）和捻毛线，手脚粗笨了，就养牛挤奶。按庄宅的规矩，每天早晨，谿堆的“聂巴”（管家）提个糌粑袋，发给每个朗生一木勺糌粑，一碗清茶，晚上再发一碗糌粑汤。“管家给朗生发口粮，比喂狗吝啬得多”。六十多年里，老妈妈没吃饱过肚子。在她的记忆里，庄园的谿堆和聂巴换过七、八次，一个比一个狠毒，她一生挨了多少打骂早已记不起来了。可是有一件事，至今一提起来，老妈妈还伤心地落泪。那是她四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给牛铡草，因为她太疲劳，一走神把右手的大拇指铡掉了。她一下昏了过去，血咝咝向外流。十多岁的女儿一见吓哭了，她急得满院子哭喊：“妈妈的手指铡掉了！妈妈的手指铡掉了！”可是谿堆、聂巴没人理她。当孩子哭着又跑回到她跟前的时候，她刚清醒过来，只见一只大狗，不声不响地走过来，叼起她的手指跑掉了。母女俩相对痛哭起来。就这样，，主人始终没管。可是第二天，她没按时出工，那个大鼻子聂巴就骂着逼她出去放牛。她的伤口用块脏布包了一下，又沾了水，手指下半截很快化浓了，眼看一点点向上烂，没有一点办法。最后还是另一个朗生，弄来一块酥油，用铁勺在火上煎得滚开，把老妈妈的伤处向油里一插，只听滋啦一响，她又一次痛得昏了过去，清醒过来时满头大汗，这样手才没有烂掉啊！

老妈妈苦熬到六十岁，女儿珠玛次仁接替了她。按规定，她可以“自由”了。通常情况下血汗被榨干的奴隶就会被赶出主人的大门。可是老妈妈还能干活，她要求帮女儿看牛，才被允许留下了。

作为朗生，老妈妈三代没住过房子，屋檐下、走廊边、牛棚、马棚，就是她们的住处，身上的破毛布衣，夜晚就是被盖。老妈妈的母亲在牛棚里生了她，她又在马棚一角生了儿子和女儿，儿子生下不久饿死了。女儿珠玛次仁又在牛棚里生了外孙女。这孩子已经四岁了，还不会说话，瘦小得可怜。作为人，老妈妈和女儿都生儿育女，但都没有丈夫。因为作奴隶的，除非男女双方都属于一个主子，都没有自己的家，也很少有固定夫妻的。有次我们在一棵大树下遇到老妈妈和她的外孙女，我们问到这孩子的爸爸，老妈妈叹口气，指着树说：“她那有什么爸爸，可怜的孩子，和她妈妈一样，都象这树上的叶子一样啊！”

“你是一个马铃铛的价钱卖给人家的！”

在农奴制度下，农奴们，特别是女奴隶们，不仅被领主用来封赐、赠送、布施、陪嫁、陪赘，而且用来买卖。这种买卖，有时也在农奴之间进行。十六岁是的农民代表维赛，就是十两藏银的身价被卖给一个差巴户作朗生的。当时的十两藏银正好买一个马铃铛。

维赛的妈妈，是拉萨大贵族赤门家的朗生，十年前病死

了。六岁的小维赛就逃出来和爸爸流落到山南。可是父女两人走了三处,找不到一个能给吃饱肚子又不打骂的主人。最后,爸爸把他留在泽当一个名叫阿觉索郎的差巴家里,自己又流浪去了。那时,维赛刚满十岁,就天天替差巴给他的领主寺庙和过路官员支乌拉。每次,官员或活佛骑着她主人家的马,逍遥前行,她就徒步在后紧赶。夏天,强烈的阳光把路面的沙石晒得火热,她没有靴子,赤脚走在上面,脚掌被烙得疼痛难忍,她哭泣着,拼命快跑。冬天,她的破衣挡不住风雪,小小身驱被冻得发僵。有时官员打马长跑,她怕到站找不到马,就死命拉着马尾巴跟着急驰,到马站时,已被拖得喘不过气来。如果是出驮运乌拉,她最少要赶三头驴子。半路爬山过河,驮子翻了,她人小搬不动,就坐等过路人帮忙。有时候,从早到晚,等一天也遇不上一个行人,她那一小袋糌粑吃光了,风雪袭来了,她就只能偎在驴身旁,哭啊!哭啊!直到什么时候来了过路人,帮她上好驮子为止。就这样,她还是要饿着肚子把东西运送到站口,然后沿路讨饭回来。大一点了,主人就派她给寺院作乌拉干田间活儿。有一次,她正拔草拔得满头大汗,寺庙的堆巴来了,一看,这块地不是寺庙的,她认错了地块,白费了工夫,堆巴把她拳打脚踢一顿,当晚挣扎回来以后周身疼痛发烧,三天爬不起来。她一年四季从早忙到晚,连洗头的时间也没有,满头虱子咬得受不住,她重就央求人剃了头。直到现在,不熟识她的人,谁也看不出她是个女孩子。她的遭遇,她自己还是不久前才弄

清的。那是有一次她去背水，不留心丢掉了一把铜勺，女主人一边打一边骂：“你的命还不如那把勺值钱呢！”她跑到邻家老婆婆那里去哭，老婆婆才悄悄告诉她：“孩子啊！你是一个马铃铛的价钱卖给人家的啊！”

西藏农奴制度下的劳苦妇女，就是这样一代代受着奴役、摧残，就是这样在饥寒疲惫中，在泪水、血泊中，死了去，活过来。过去，这无边无头的痛苦她们无处诉，只能在劳动中含泪轻轻地唱：

“伤心的话儿，不要向谁说，怕的是亲人过分悲哀，仇人幸灾乐祸。

伤心的话儿，只可以告诉山岭，虽然山岭是石头和泥土，但它听了也会点点头。”

姐妹们自由了

从农奴主庄园的田野，从庄园中大庄宅的灶头和牢房，来到眼前这个用红花绿叶装饰起来的会场，只是一段短短的路程，但这段路程却跨越了千年的历史。谁只要了解了西藏劳苦妇女过去的重重灾难，谁就会理解这段路程的巨大意义。它宣告：西藏农奴翻身解放的日子来到了，过去被压在最底层的女奴隶们也站起来了。

这些天，我们在山南古城泽当附近的农村，听到了多少妇女含泪哭诉她们的悲惨身世，也看到了她们获得自由解放的无比欢欣，诸情诸景，令人终身难忘。

坐在我们眼前的姑娘基嘉、采旺德吉已经结束了朗生的生活，她们自由了，安家了，都被选成了谿卡农会副主席；孩子被鞭死在肚里的苍觉，也被选为泽当镇的农会副主席，她高高兴兴向我们说：“从前我们额头是暗的，现在总觉得额头在放光。”其美错姆老妈妈母女外孙三代，已从牛棚搬到庄宅一间大屋子里，老妈妈养了一辈子奶牛没喝过牛奶，今天喝上自己牛产的新鲜牛奶了；小妹妹维赛，前几天拉着她主人的手，来到民主改革工作队，理直气壮地向主人说：“现在我们当面讲清，你买我的那十两银子无效了。从今天起，我自由了。我愿在你家，你要给我算工资，我不愿在你家，由我自己作主。”工作人员乐得哈哈大笑，说：“小妹妹，你真行啊！就照你说的办。”

千百年的黑暗制度，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彻底破坏的；新的生活，也不是一个早晨就建设起来的。但这个伟大的过程已经开始了。获得自由的姐妹们多么兴高采烈啊！每天清早，你可以看到村边水渠上，许多妇女在洗脸洗头发。她们说：过去连洗脸的自由也没有。一则没有时间，二则你洗了脸，贵族老爷或管家会说：不快快干活儿，洗什么脸，谁欣赏你的脸！现在，随我高兴，我可以一天洗三遍！村里开会的时候，她们拿着柳枝、野花，呼口号，讲道理，谁也不敢小看她们。在田里劳动的时候，她们放声歌唱。她们说：过去唱歌的自由也没有。在田里唱歌，聂巴怕耽误干活，寺庙说妇女唱歌要下雹子，要遭灾。今年歌也唱了，活也多干了（因为收

获归自己), 雹子也没下。不但没遭灾, 而且越唱越赶“札喜德来”(吉祥如意)! 她们唱什么呢?

她们唱道:

奴隶们解放了, 有了作人的权利,
有了作人的权利, 坐在白色的帐篷里。
姐妹们解放了,
有了自由的权利,
有了自由的权利,
歌唱在自己的田野里。

(1959年7月初于山南泽当)

西藏山南农奴迫切需求改革

西藏山南地区广大藏族农民，最近一个时期，纷纷向工作人员诉说他们世代在农奴制度下，所受乌拉差役、人身奴役和苛重的高利贷、地租等压迫剥削的痛苦，迫切要求实行民主改革，首先是实行“三反双减”（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人身奴役和减租减息），使他们获得人身自由和安宁，减轻经济负担。有的地方农民已初步组织起来，投入了民主改革第一步的斗争。

山南是西藏主要农业区之一，这里农奴制度历史最久、最完整，至今还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全区五十多万亩土地全部属于三种领主（贵族、寺院、政府），十几万劳动人民也随着土地隶属于领主，成为以人身依附为特点的农奴，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完全处于奴隶地位，如叛乱分子首领、大贵族索康·旺清格勒的庄园凯松谿卡，三百零二名农奴人口中，就有五十一名“朗生”（家奴）和“差徭”（由差巴户派来或由领主抽调来的田间奴隶），其

他庄园也大体如此。其他农奴受差役乌拉、高利贷、各种贡税和地租等的剥削也极为惨重。据初步调查，差巴（耕种领主拨给的份地世代支差纳贡的农奴）户每种一“岗”（大小不等，一般为三十克左右种子的土地，相当于三十亩左右）差地，就要出常年“乌拉”（为领主无偿服劳役的人）二至三人，此外还要为领主出成百头次的马差（领主和官员等路过时骑马）、牛差（为领主驮运物资）。领主租给“堆穷”户（不种差地，靠租小块地和打短工过活，向领主交人头税的农奴）的土地，地租占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农奴欠的高利贷一般是利上加利，世代还不清。叛匪在山南盘踞的十个月，群众又深受烧杀淫掠之祸。因此山南农民对实行“三反双减”的要求特别迫切。

山南地区各县平息了叛乱建立起人民政府以后，已陆续派出藏、汉族干部和解放军工作人员深入农村，一面发放救济粮、款和茶叶等，帮助群众恢复生产，一面发动、组织群众，迎接民主改革。这期间，群众纷纷诉说他们在农奴制度下的非人生活和万般痛苦。乃东县乃东区巴珠三姊妹诉苦说：外祖母抵债作了则措巴寺的朗生，母亲就随外祖母从小到老作朗生，到了她们这一代，巴珠和她的两个妹妹、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被强迫作了朗生。她们终年作背水、下田等苦重的活儿，每人一天一小升糌粑，三年一双布靴子，常年半饿着肚子，赤脚露体。她们举着领主特制的一个小升（每升糌粑约半斤多点）和没底的靴

子边哭边讲：请乡亲们和工作同志们看看，我们世代代是怎样过来的，再不改革，我们还能活下去吗？农奴多吉夫妻，因为欠领主的高利贷粮还不起，领主管家就下令每人打了一百鞭子，他们三个月爬不起来。大农奴主私设刑房、残害农奴的事，最近也被大量揭露出来。拉加里县号称“拉加里王”的大农奴主拉加里·郎吉绛错家的监牢里，最近发现了三具完整的尸体，都是绑起手脚活活饿死的。其中一个中年妇女的尸体，皮肉、头发、衣服和绑在身上的绳子都还没烂（因房子阴冷）。一个女孩的尸体是赤身被装在大盐罐里的，上面压着石板。农奴们见了这些被害者的惨状，无不悲愤填膺。他们说：再不能让吃人的农奴制度保留下去了！他们要求第一步首先废除人身奴役和乌拉差役，取得人身自由。

现在乃东、扎囊、贡噶、哲古等县农民，已在各县中共县委派出的工作组帮助下，组织起了第一批基层农民协会，农协正领导大家一面生产自救，协助解放军肃清叛匪残余，一面组织农民学习民主改革的政策，有秩序地进行诉苦和算受剥削的帐，准备很快开展民主改革第一阶段的“三反双减”。

（泽当1959年6月30日电）

西藏民主改革在山南展开

(内部报道)

西藏作为民主改革初步阶段的“三反双减”(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人身奴役和减租减息)运动,从本月上旬起在山南地区各县陆续展开。

山南地区是西藏农奴制保存最完整的主要农业区。全区有五十多万克土地(一克即能播一克种子的土地,约一亩),十七多万人民。西藏的大农奴主,特别是世袭的老贵族,大都在山南有“谿卡”(封建庄园)。叛乱分子头子索康·旺清格勒就在山南有六处庄园,若干牧场。估计在山南有庄园领地的贵族有五六十家,占有土地十几万克。山南地区有大小寺院二百五十座左右,喇嘛(包括少数尼姑)近二万人,这些寺院多为拉萨三大寺和布达拉宫所属分寺。寺院占有土地约二十万克,余下为“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和其所属机构以及各“宗”(相当于县)所属土地。三大领主(贵族、寺院、政府)全部实行农奴制。在西藏反动农奴主发动的叛乱中,山南区绝大多数领主参加了叛乱。叛

匪一度把山南作为巢穴，盘踞近一年时间，包括胁从分子，多时达一万多人。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山南地区农奴所受苦难和蹂躏极为惨重，因此群众一觉悟起来，革命斗争热情很高。

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和西藏工委意见，山南分工委决定把“三反双减”作为六、七、八三个月的中心工作，目的是通过充分发动群众，肃清叛匪残余，把农奴、奴隶从繁重的乌拉差役、野蛮的人身奴役以及寺院的封建特权下解放出来，树立以贫苦农奴为优势的社会秩序，为下一阶段的土地改革打下基础。

从上月末召开军政县团级干部会议部署上述任务后，半个多月来，全区十二个县（原山南区二十二个宗和原塔布地区一部分合并成了十二个县），都已进入“三反双减”第一步，即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有的县这一步已完成。办法是由县委、县政府派出若干工作组，深入各区、庄园发动群众，开展诉苦教育，成立农民协会（开始为筹委会，经一段考验改为正式的农协）。基层农协以一个庄园或一个工作组领导的几个庄园为单位，几十户到几百户不等。农协委员多为“朗生”（家奴）、“差徭”（田间奴隶）、“堆穷”（没有差地靠租种小块土地或作短工、手艺为生的农奴）和穷苦“差巴”（耕种差地、世代为领主支差纳贡的农奴）为主。

农协一成立，运动就进入第二步，首先是召开诉苦斗争大会。乃东、桑日、贡噶、拉加里等县，都已开过多次

这种由基层农协主持的大会。由于参加叛乱的大农奴主、主要官员等大都已逃往印度或在拉萨就擒，所以斗争对象多为参叛的“谿堆”（庄园管理人）、寺院“堆巴”（管家）以及勾结叛匪欺压、残害群众的小恶霸、小头人等。这些人虽非反动农奴主，但他们平日直接压迫、剥削群众，有的血债累累，叛乱期间，又和叛匪搅在一起，作恶多端，所以群众对他们非常仇恨。

这些斗争大会上，农奴们第一次站起来控诉反动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罪行，诉说自己的深仇大苦。蓬头赤脚的妇女，囚首垢面的男人，白发苍苍的老人，衣服褴褛的孤儿，纷纷起来诉说，他们怎样世代为奴，终身被人踩在脚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怎样被乌拉差役、高利贷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卖身抵债，又如何遭受主人毒打和被施以酷刑，至今身带残疾，有的亲人如何被残害。农奴们讲到极端痛楚处，捶胸顿足，抢地呼天，要求人民政府和众乡亲为他们作主，讨还血债。尽管会上都宣布不准动手打人，但仍有一些大会群众在悲愤之际，一哄而起，拳头棍棒，把斗争对象饱揍一顿。

这种大会开过之后，各区、各庄园的农奴们又在大会小会上算乌拉帐（计算包括人差、马差、牛差等在内的无偿劳役负担），算高利贷帐，并组织起来向参叛的反动领主示威，宣布取消乌拉差役，索回高利贷债契。乃东县所属的乃东、昌珠、凯松、凯墨等区、村的群众就联合起来，

男男女女，列成几千人的队伍，打着旗子，擂着大鼓，一路高喊着“消灭叛匪！”“消灭乌拉差役！”“消灭高利贷！”等口号，示威游行。到参叛债主门前，索回债契，当众焚毁（减租减息是对未参叛领主，对参叛领主是废租废债），然后唱着歌子，凯旋而归。

经过这些斗争，农奴群众已组织起来，农奴制度除土地所有制外其他许多方面已迅速崩溃，农村形势起了很大变化，社会秩序大为安定，叛匪残余分子无处藏身。乃东县有名的恶霸、参加了叛乱的大差巴德吉康萨（过去宗本不在时他代理宗本）就是由群众报告并帮助捉回来的。

现在运动开展较早的区村，农协正领导群众解放“朗生”、“差徭”等奴隶，并帮助他们安家。运动开始转入第三步，即整顿队伍，巩固阵地，迎接民主改革的下一阶段——土地改革。

通过“三反双减”斗争，确实打掉了反动农奴主的威风，农奴们笑逐颜开，扬眉吐气。凯松谿卡开过诉苦和斗争农奴主狗腿子大会后的当天晚上，群众自动集合到林卡里喝“羌”（青稞水酒）跳舞。乃东农协主任开过斗争大会后跑到渠边洗了头发，说：“我从生下来从来没这样高兴，把多年的满头虱子都洗掉了！”贫苦农奴中普遍流传的一句话是“吉卫尼玛夏松！”（温暖的太阳升起来了！）

西藏民主改革，按中央指示是和平方式的革命。但由于千百年来，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摧残、剥削极端野

蛮、黑暗、残酷，种下了血海深仇，群众一旦起来，就不免出现一些过火暴力行动。正是在这种情绪下，山南地区在这段运动初期，就一度出现了打人和乱捕人的问题。

据检查，乃东县打死斗争对象七人，其中直接有人命债的三人，有各种民愤的四人。他们都是反动领主的代理人、管家和群众称作狗腿子的人等，还不是罪大恶极的人。桑鸢、拉加里各打死一人，主要是工作组掌握不当。凡是工作组在斗争中既充分支持群众斗争热情、又注意说服教育群众坚持说理斗争，不要打人，更不要打死人的，一般都未打死人。凡工作组工作粗糙，不向群众交待政策，或同情群众过火行为的，就出了问题，结果造成消极影响。

还有一些地方，积极分子不注意团结发动群众，自觉势力孤单，怕敌人报复，就把自己认为不可靠和可疑分子先捉起来，形成乱捕人现象，乃东县大吉林区运动开始就捕了六十多人。

对于上述问题，山南分工委和有关县委已派人进行了检查纠正，对工作组加强了政策和纪律教育。

(泽当1959年6月23日电)

民主改革中的山南农村

呈现一片繁忙欢乐景象

初夏来到了风光美丽的西藏高原山南地区。雅鲁藏布江及其南岸支流温暖的河谷平原上，油菜花盛开，青稞开始抽穗。碧绿金黄的田地里，一群群藏族妇女忙着除草、灌水，不时传出嘹亮悠扬的歌声。

去年此时，叛乱分子在山南集结，匪徒们抢粮支差，杀牛捉羊，奸污妇女，闹得田地荒芜，村落凄惨。今年此时，正在进行民主改革的山南翻身农奴，第一次过上了为自己劳动的和平自由生活。

历史上曾是西藏政治、文化中心的泽当古城所在的乃东县，大片肥美的土地都是参加叛乱的大农奴主的庄园。自从山南军管会宣布参叛领主土地今年实行“谁种谁收”（秋后再分土地）以来，庄园里农奴们的积极性特别高涨。世代在庄园领主的“自营地”上作“差徭”（田间奴隶）、当“乌拉”（服劳役者）的男男女女，自动组成了生产小组，共同耕作、拔草放水，这是他们第一次自由地为取得自己

的劳动成果而流汗。他们形容今天的轻松快活心情说，“像是摘掉了生牛皮帽子”（戴生牛皮帽是西藏农奴主迫害农奴的一种酷刑。牛皮湿的时候缝成帽子戴上，越干越紧，箍得人头昏眼胀）。

泽当附近有上万克（一克种子的地约一亩）土地靠一条大渠灌溉。这条渠因年久失修，往年每到雨季，总要淹没一些土地，雨少时水量不足又闹旱灾。“差巴”（耕种差地向领主出乌拉差役的农奴）们想修，但因差役太重没力修。今年民主改革中成立的农民协会一号召，各庄园开始翻身的农奴，男男女女，自动集合起来，举着红旗，打着鼓，来到了渠上。他们和驻地解放军、机关工作人员组成了八百多人的修渠队伍，紧张劳动六天，把这条百里大渠破坏最严重的一段彻底修好了。他们从几里路以外的高山上背来石块、石板，把堤岸和渠底铺好打实，运石的长蛇阵中欢乐的歌声此起彼伏。泽当镇农协主任、修靴匠坚赞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快活地劳动过。因为小孩子也明白，今天我们劳动是为自己了！”

乃东区正开展“三反双减”运动，农协发现田里草多了，就组织起了许多拔草队，包括驻地解放军和工作人员，那里有草荒就到那里拔，四、五天内就把三千克青稞田里的杂草拔得干干净净。刚刚获得解放并安了家的朗生也参加打草。从祖先起作了多少代的朗生次丹拉姆告诉记者：我们打的这些草，是晒干贮存起来明春喂庄园耕牛的，这

些牛很快就是我们的了。

在雅鲁藏布江边的桑日县戎区，往年修水渠，都是由宗本和寺院管家下令，“勒本”（工头）用皮鞭赶着农奴们去修，结果还是许多天修不好，有些田地因缺水，庄稼枯死。今年由农会领导，农民自动来修，男女都坚持在大雨中背石头，不修好不回家，结果一天多就修好了。

民主改革中欢欣鼓舞的山南区农民，开始自由地建设新生活。

附 录

拉萨叛乱真相纪实

编者按：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记述的是一九五九年拉萨叛乱的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由当时在拉萨亲历全过程的记者集体采写。距今已三十年，迄今在已披露的同类史料中，当以此篇比较详细，这里首次发表，附录于《西藏春潮》之后以备治藏事和研究藏史者参阅。

拉萨叛乱引起世界人民如此广泛的谈论。根据许多目击者所提供的情况和缴获的大批材料，我们决定把拉萨叛乱的真相全部记载下来。

在清理这个事件的过程中，使我们大为惊奇的是，西藏上层叛国集团竟是如此的恶毒而愚蠢：当中央人民政府付出了最大的忍耐力来等待他们的觉悟，决定推迟这个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间罕有的残酷的、腐朽的、黑暗的农奴制度死亡日期的时候，这里的上层反动集团却迫不及待地公开地发动了叛乱。这样，就终于不能不提早加速他们

自己的死亡。

这是反动分子自己制造的悲剧，世界上所有正义进步的人们为腐朽势力的死亡而感到高兴，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包括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却为此大为恼怒，毫不羞耻地进行歪曲和捏造。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

在辨别事件的真相时，人们关心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事件的“主动因素”来自何方？

这里需要首先从达赖喇嘛决定到西藏军区看戏说起。

看戏事件的经过

每年藏历的十二月二十九日，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冬居地）都要举行一次“跳神”的宗教仪式，藏语叫作“拉爆”。今年跳神的一天，是在1959年2月7日。按照往年的惯例，达赖喇嘛邀请了中共西藏工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机关的一些负责人，同他一块观看“跳神”。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将军和工委秘书长郭锡兰等，在这天应邀来到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表示祝贺。

在休息的时间，达赖喇嘛同邓少东将军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同平常见面时一样，双方进行了非常随便而无拘束的交谈。达赖喇嘛问起了祖国内地建设的情况，问起了首都北京面貌的改变，他表示了向往的心情，而且提出要在今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会时，去北京出席会议，同时看看祖国内地的伟大变化。

话题无意中转到了西藏军区。达赖喇嘛询问了军区机关的一些情况，当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刚从内地学习回来时，达赖喇嘛很感兴趣，他问起文工团有多少人，以及有什么好的节目。他表示了希望看看文工团文艺表演的愿望。

邓少东将军当即表示欢迎说：“达赖喇嘛如果要看戏，我们热情欢迎，什么时间和在什么地方，请你决定。”

达赖喇嘛说：“最近要传大召（传召是拉萨每年一度的大法会，喇嘛们集中到大昭寺祈祷，领取布施，传大召为期21天），考格西（格西意为善知识，是佛教中很高的一种学位，在僧众大会中辩论经籍考取），等考完格西以后，我要看看文工团的表演，地点就在军区礼堂，因为文工团表演时要布景，在那里比较方便。”

达赖喇嘛希望到军区看文工团表演，邓少东将军当天就将这件事告诉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柳霞和夏苏等噶伦（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三品，是组成噶厦的主要成员，设立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后，随噶厦被解散而废止）。

根据达赖喇嘛的要求，工委统战部很认真地着手筹办这件事情。三月一日，统战部副部长何祖荫和处长李佐民专程到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居地）去向达赖喇嘛请示说：“我们听说在去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达赖喇嘛向邓副司令员表示要去军区看文工团表演，因为当时一方面要传

大召，一方面要考格西，没有预先安排具体时间。现在传召和考格西都已结束，特来请示达赖喇嘛，是否去看戏，什么时候去，并请确定地点，以便安排。”

达赖喇嘛说：“这件事我是对邓副司令员讲过的，的确想去看一下文工团的表演，地点最好在军区，听说军区大礼堂很漂亮，我一次也没去过，想顺便参观一下。时间大体在藏历二月初一、初二、初三（即公历三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任何一天都可以，究竟哪一天，待我确定后再告诉你们。”

达赖喇嘛还说：“这次我去军区，你们要安排得简便一些，免得我过于拘束，这样可以看得舒服一些，至于具体怎样安排，你们可以和代理机巧堪布（机巧堪布，僧官，总管达赖喇嘛私人事务，如同管家，无任何行政职务，但因其为达赖喇嘛待从，故实权甚大）直接联系。”

三月五日，工委统战部梁洪副部长和李佐民处长又一起到代理机巧堪布噶章·洛桑日增（三品，与噶伦平级，1959年3日随达赖外逃）的家里接洽这件事情。达赖喇嘛要到军区看戏的时间究竟是哪一天，请达赖喇嘛确定。另外，达赖喇嘛要求安排要简便，请确定邀请哪些人合适。

为时，梁洪首先提出了一个邀请的名单，征求噶章的意见。这个名单包括达赖喇嘛的两位经师，他的亲属，五位噶伦，三大寺（即黄教拉萨三大寺：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的堪布（一般为喇嘛教寺院僧职官，是寺院或其

下属机构主持人，此处是指参与原西藏地方政府公务的僧官)，以及包括噶章在内的达赖喇嘛身边的随行人员。

噶章表示很同意这个方案。他说：“这些人都很适当，不过我的意见还应该邀请达赖喇嘛的五位村晓（侍读），他们都是帮助达赖完成大业（指考格西）的，请了他们去，达赖喇嘛会很高兴。”

这时，噶章还提议：“请帖上不要印上其他文字，只是在送请帖时说明是为了祝贺达赖考中格西学位就可以了。”

噶章为什么提出这样蹊跷的建议，曾使人们不解，后来叛乱发生后，索康、柳霞（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柳霞即柳霞·土登塔巴，均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叛匪首要，随达赖外逃）等几个反动的噶伦们曾说，他们事前不知道看戏的事情，而噶章本人后来证明也是叛乱头子之一，情况原来如此。

同噶章谈话继续下去。梁洪同志提醒说：“无论哪天来都可以，只是最近叛乱分子经常挑衅，有可能利用这件事情进行阴谋活动，达赖喇嘛的安全问题，请妥为安排。”

噶章当时表示，达赖喇嘛的饮食，他可以负责安排，至于警卫问题，他要求梁洪同志与古松代清（清制额设藏军三千名，每代五百名，代即团之意，代本为代的最高军职，由贵族出身俗官担任。古松代本即达赖警卫代本）联系。

三月八日下午，噶章在电话上通知工委统战部：“达赖

喇嘛到军区看戏的时间已定在藏历二月一日拉萨时间下午一点钟，即公历3月10日北京时间下午三点钟。”

3月9日，李佐民又单独到噶章处告诉他有关达赖喇嘛看戏安排情况，并且交给噶章一份接待计划。这个计划详细说明了在军区礼堂里接待达赖喇嘛的礼节、仪式、休息时间、地点、节目内容等，甚至连进入礼堂时乐队演奏的乐曲等细节都在计划中作了说明。对于这个计划，噶章当时表示同意。

按照商量好的计划，举行文艺演出的时间是3月10日，在9日发出了请帖。3月10日这天，工委和军区作了隆重而热情的准备，礼堂被打扫一新，一些战士在修整达赖喇嘛将要通过的道路，并且向路面洒水，应邀观看演出的一些汉藏族干部按通知在10日上午11时提前到齐，准备欢迎。谭冠三将军等负责人也都提前到会场等候。会场上，准备了一些献给达赖喇嘛的花束。演员们在后台提前化妆，饰演孙悟空的那个出色的演员，在中午12时便已化妆完毕，军区院里充满了隆重而愉快的气氛。

可是，正在这时，街上传来了令人惊异的消息。人们谈到，从早晨开始，拉萨市的居民就陆续往达赖喇嘛的夏官罗布林卡集中。到上午11时，人们成群赶去，店铺纷纷关闭，市民抢贮饮水，人心惶惶。一些面目生疏的“外乡人”在街头活跃起来，市内传出谣言说：“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又说：“军区准备好了直升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

往北京。”因此，他们跑到罗布林卡去向达赖喇嘛请愿，阻止他到军区看戏。

这时准备接待达赖喇嘛的人们，还继续等候在会场，同时消息也不断传来，就在几个小时以内，情况迅速发展和恶化起来。不久，人们证实，群众已被煽动到罗布林卡门前“请愿”，成千的武装叛乱分子包围了罗布林卡，进步的藏族官员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在罗布林卡大门外被打死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也在那里被坏人用石头打伤。

军区院里，人们仍在恭候达赖喇嘛一行的到来。直到下午三点多钟，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索康·旺清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即夏苏先喀·居美多吉，三品代理噶伦，后随达赖逃亡）等三个噶伦（都是叛乱头子）来到军区，向谭冠三将军假惺惺地说，他们事先不知道达赖喇嘛要来看戏，现在事情的发展使他们无能为力，达赖喇嘛肯定不能来了。

谭冠三将军当即严厉地斥责了三个反动分子，他说：“几年来，我们支持达赖，尊重达赖，可是噶厦政府一直违背达赖的指示，甚至他连看戏的自由也没有了。今天的事情显然是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反动分子有计划制造的阴谋活动。”

谭冠三当面驳斥了反动分子的花言巧语，他说：“达赖喇嘛再三表示要来军区看戏，而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反动

分子煽动群众阻止他来，并且制造了今天的事件。”他质问道：“这是达赖喇嘛领导噶厦，还是噶厦领导达赖喇嘛？”

谭冠三还说：“达赖喇嘛自己决定要来军区看戏已一个多月了，而且当时邓少东副司令员曾郑重通知噶厦，现在噶厦竟说不知道此事，特别说不知道反动分子今天的阴谋，显然不能令人置信。”他问道：“柳霞，你也不知道这件事吗？”柳霞哑口无言，意不能置一词。

谭冠三将军最后坚决地表示：噶厦必须负责保护达赖喇嘛的安全，噶厦要彻底追查今天这一事件的主谋人，追查和法办杀人的凶手，对于被叛乱分子打死的人员要负责抚恤和安置，妥善处理。

当时，索康等三个反动分子无言答对，只好以表面答应回去负责追查处理来搪塞。他们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同工委和军区负责人见面。

事实上，看戏事件只是反动分子利用和早已安排好了的阴谋。这里首先指出一点，在九日晚上，朗子辖（即拉萨市旧政府）的墨本（即市长）受原西藏地方政府指示，即首先下达了命令，煽动说：“达赖喇嘛10日要去军区赴宴，汉人准备在席上毒死达赖，每家都应派一代表去罗布林卡请愿，要求达赖不要去军区。”10日早晨，命令传达到市区居民和各寺庙中。在当天，人们还看到，俊巴·才仁多吉代本（当时俊巴·才仁多吉任六代本）亲自在街上驱使群众去“请愿”。有一些西康人（即潜入拉萨的康巴叛匪）则

骑马在街上大喊大叫，胁迫群众快去罗布林卡，另一些原西康人则骑马带枪乱窜于市内，有的扬言说：“今天达赖如果要到军区去，就要打仗。”有的又煽动说：“达赖已被劫往军区，你们要赶快去抢救！”

反动分子有计划地制造骚乱，市内秩序立刻混乱起来。当时到罗布林卡的各色人等约有二千人，其中并有二三百人携带着长短枪，俨然如临大敌。

从这段事实经过中，人们可以看出，从提斯浦耳发出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怎样捏造和混淆了事实真相的，原来看戏的事情并不象“声明”中所说的达赖喇嘛“同意”，而是达赖喇嘛自己提出要求的，看戏的日期曾经数度商讨，怎么说是“突然规定”的呢？至于“声明”中所说的“拉萨人民担心达赖喇嘛可能受到某种伤害”，可是，这种“担心”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问题原来是这样的明显，大量的谣言，恶意的煽动，已经很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看戏事件前后的详细经过。

拉萨三月叛乱的背后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3月10日公然在拉萨叛变祖国，绝不是因为看戏问题而偶然发生的事件，而是一个长期策划的阴谋。

不必从和平解放西藏说起（事实上近八、九年以来，反动分子就没有放弃过分裂祖国的迷梦），事情的明朗化是

从1958年4月开始的。当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暗中勾结康区的恩珠仓·贡布扎西（四川理塘县人，巨商富豪，1956年在理塘地区发动叛乱，后逃到西藏继续组织、扩大叛乱，失败后逃往印度）等叛匪首要，组织了所谓“四水六岗”等反革命组织，在拉萨地区极力买枪、买马，扩大叛匪组织。

1958年8月，恩珠仓在山南地区网罗了七八百叛匪，他们暗中得到西藏反动集团的支持。那时，西藏地方政府在日喀则附近南木林宗的噶丹青稞寺有一个武器库，它处在叛匪袭击的危险中。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领导，曾数次向索康等噶伦提出，要噶厦采取措施，将武器转移或派人看守，噶厦置之不理，最后竟将这里所有的武器弹药，包括420支步枪，10万发子弹，12支美式冲锋枪，8挺轻机枪，6门炮及数百发炮弹，全部送给了恩珠仓。从去年以来，拉萨的反动分子还不断去直接参加叛匪的组织，一、二、四、六代本的藏军，一批一批地携带着噶厦发给的武器跑到山南去。这样积极支持和策划的结果，到去年年底，在山南、丁青、藏北、塔工一带，叛匪的组织发展到了一万四千多人。

反动分子在那个时候，事实上早已开始里通外国，向着印度扩张主义者，暗中背叛祖国了。他们在去年九月以后的一个短时期内，在山南地区接受了通过台湾国民党当局之手的三次空投接济，其中有重机枪、无后座力炮、迫

击炮以及衣服、医药、鞋子等物资，另外还有八个从台湾派来的医生和一些军官。以后又从印度经过达旺等地秘密进来260多头牲畜驮运的由某些外国支援的武器弹药。

叛乱分子在这方面的确是有指望的。在这次拉萨叛乱时，潜入拉萨的一个康匪头子，所谓全体藏康族的总代表马朗阿波（即马朗仓·白马次汪，现已在山南被俘），在19日的伪人民代表会议上，曾向叛乱分子打气说：“如果在拉萨失败，我们可迁到桑当、贤绒，最后到山南的泽当。那时我们可以把泽当变成台湾那样，作为根据地，然后再与汉人谈判，同时，外国也会派飞机来援助我们。”可是叛乱分子没有想到，他们在山南的巢穴竟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荡平了，而且是如此迅速。

中央人民政府早已发觉西藏叛国集团这些罪恶的阴谋，然而仍然以最大的忍让来等待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回头。当时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领导机关认为，只要拉萨不公开叛乱，对于拉萨外区的叛乱活动便始终当作局部问题来对待。那时，军区的负责人曾多次忠告索康等反动分子说：“索康噶伦哪，仗是打不得的，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都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地方政府要想反对祖国，岂不是梦想？”

可是，一切忠告都终归无效。到今年二月间，叛匪增加到约二万人，情况愈加严重。青藏和康藏两公路的运输被断绝，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不断受到袭击，人民群众

遭到严重摧残，为了有计划地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山南的康巴叛匪头子恩珠仓，在去年12月间还在沙丁（怒江中游）专门召开了会议，拟订了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叛乱分子决定今年开春之前，首先攻下扎木、丁青、泽当、林芝等重要据点，然后破坏青藏公路，前后攻占拉萨。

这个计划从今年一月份开始执行了。1月4日，1600多名叛匪向扎木攻击；1月24日有二千多叛匪攻打丁青；1月25日，继去年10月进攻泽当失败后，两千多叛匪又再一次包围了泽当……。在这种情况下，山南等地区的人民群众遭到了严重的涂炭，当地的政府机关受到极大的危害。形势虽然如此严重，可是人民解放军拉萨部队仍然没有准备全面平叛。由于他们尽量顾大局，采取守势，这就给了叛乱分子以错觉，反动分子们似乎认为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软弱可欺，于是，得寸进尺地向我进行更加严重的挑衅。

拉萨叛乱分子的头脑开始昏昏然了。他们利用今年传大召的机会，到处散布“拉萨要打仗”的谣言，公开地张贴反动标语，并且肆意地制造事件，进行挑衅。例如，反动分子曾公开逮捕两个汉族工人，并造谣说：“这是中央派来刺杀达赖的刺客”，一会又说“这是日喀则派来刺杀达赖的刺客”。有一次，反动分子还借口保卫达赖，企图强占我一个机关的住房。在保卫达赖的借口下，反动分子甚至极端狂妄地把机关枪架到中共西藏工委的门口，企图极力挑

起战火。

当这一切挑衅活动失败之后，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戏的事件便被利用了。他们在制造了群众的骚乱之后，为了不失时机，不等攻下拉萨外围的据点，便终于迫不及待地最后撕下了假面具。三月十日的事件，标志着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和西藏地方政府公开地全面叛乱的开始。

武装包围罗布林卡

叛乱分子有计划地制造了混乱的形势。他们在“保卫达赖喇嘛安全”的借口下，十月下午，便武装包围了罗布林卡。在混乱中，曾有二三百个康巴匪徒持枪呼哨赶到罗布林卡，一些流氓游民和反动喇嘛，都成了“卫教志愿军”

（叛乱武装组织，按藏军编制设立司令部，下设四个机关，三十六个连队）分子。有些反动喇嘛在以后还组织了“敢死队”。由噶厦控制的藏军，此时也公开地变成了反革命武装，他们同叛匪一起，包围了罗布林卡，控制了罗布林卡附近的药王山制高点。

整个3月10日这天，除了被煽动和胁迫去“请愿”的群众以外，集中在罗布林卡的叛匪大约有1000多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都被发给了武器，以后这些叛乱分子就驻扎在罗布林卡。

根据从功德林和罗布林卡缴获的两份叛匪文件证实，当时，罗布林卡的东西南北四面，都分别增派了叛匪驻守。

驻罗布林卡内部的叛匪兵力共有近三十个以来自各地的叛乱地区命名的小部队，例如有理塘人、巴安人、昌都人、甘孜人等等各种名目，其中最多的是康匪。此情况证明，反动的西藏地方政府早已成为网罗四方叛匪的老巢。

在这种情况下，罗布林卡变成了拉萨叛军最大的巢穴，叛匪总司令部就设在罗布林卡。司令部下设五个办公室，即：枪支和人员管理机构，枪支弹药分发机构，粮秣供应、审询机构，情况和历史记载机构等。除上述五个办公室外，还设有专人负责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外国华语广播的消息，另外由一代本负责在药王山上刺探解放军等机关的汽车来往情况，获得消息和情报，都及时报告叛匪总司令部。

现在已经查明，叛军总司令部的首要分子是：藏军副司令洛珠格桑、堪穷（原西藏地方政府僧官衔名，相当四品）多阿他钦、孜本雪苦巴·嘉样凯珠（孜本为四品俗官，主管西藏地方政府财政和人事，地位仅次于噶伦）、功德林扎萨·威色坚赞、堪穷格桑阿旺、仁希（即四品官）夏格巴·洛桑顿珠（仁希是四品官），他们组成常务会，又名总管处，负责控制叛匪的军政大事。

大批武器从布达拉宫的武器库里分发出去，其中主要是过去英国供给噶厦的枪支。外区逃来的叛匪大部分都被武装起来了。三大寺和小昭寺都纷纷要求增发武器。色拉寺三个札仓提出的报告说：“为了警卫达赖喇嘛和守卫上下

两宫殿（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寺庙、山顶等，需要武器枪支（带子弹）二千左右，和尽量多的机枪等，并请派熟悉武器和山顶信号之士兵十人左右前来教练。”3月15日，叛匪从布达拉宫武器库运出250支英国枪和25箱子弹（每箱一千余发），交给了色拉寺。

为了扩大叛匪队伍，叛乱分子曾在3月12日开会，命令所有群众盖章参加叛乱，又以“保卫达赖喇嘛”的名义，煽动各地和各行业的人民参加“民兵”。朗子辖曾经专门在市内召开“房主会议”，下令16岁到60岁的男子进行登记。平叛中解放军在罗布林卡缴获了一份以“西藏全体会议”的名义发给各宗（县）、谿（区）的命令底稿，这个反动命令公开威胁康藏广大僧俗人民说：“为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所有16岁到60岁的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等，立即赶来拉萨，不得怠慢”。命令说：“如有对宗教之事不负责任、贪生惜命、抛弃事业者，定将依军纪给予惩处，而不是口头说说罢了。”

据比较可靠的统计，在拉萨叛乱的过程中，全市集中了大约有七千多叛乱分子，其中盘踞在罗布林卡周围的约有五千人。

严密的封锁和包围，使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完全失去了自由。他在叛乱分子的软禁下，愁眉不展，饮食不进，甚至连罗布林卡的院子周围都不能随意走动。他同他的母亲和姐姐也都被隔离开来，不能自由见面。达赖的母亲在

11日见过达赖喇嘛一面，达赖埋怨她说：“反动分子包围我，不让我到军区看戏，你们为什么不去，而且还搬来罗布林卡？现在我有危险，你也出不去罗布林卡了。”他母亲说：“要死死在一起。”

在这种困难的处境下，达赖喇嘛曾经明显地向那些叛乱分子表示了抗议。他说：“我看不到我的安全有什么危险，你们这种作法，反而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危险！”

四，流血开始

3月10日的拉萨叛乱，反动分子几乎是一开始就用流血事件作了开端。

10日上午11时左右，成千的人拥挤在罗布林卡门前和通往那里的大路上。这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藏族爱国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听到街上传出谣言，他立刻骑着脚踏车也赶到了罗布林卡，希望探询一下事情的究竟。

帕巴拉·索朗降措是现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的哥哥，他们俩都是西藏著名的爱国人士，一直反对叛乱，因而遭到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仇视。

10日中午12时左右，当索朗降措赶到罗布林卡门口一个石狮子前面的时候，忽然被叛乱分子发现。匪徒们包围了他，咒骂他，指责他是“反动分子”，并且立即指挥暴徒

用刀和石头向索朗降措猛烈袭击。当这位官员被打倒在地还在继续挣扎的时候，一个匪徒竟赶上前去，残暴地用刀将他戳死。

下午3时左右，有几个西康匪徒把帕巴拉·索朗降措的尸体拖来，用绳子一头拴住两脚，一头拴在马尾巴上，沿林卡大道拖进拉萨市内。尸体被拖了两公里，最后丢在“幸福之光”电影院附近。这时，这位爱国分子的尸体，已经被拖得面目全非，令人惨不忍睹。匪徒们这种残暴的罪行，激起了群众的痛恨和恐怖，一些被欺骗参加“请愿”的人，纷纷地偷偷走散。

就在匪徒们打死帕巴拉·索朗降措之后不久，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在罗布林卡门前，也险些丧命。当时桑颇·才旺仁增是乘汽车赶到罗布林卡的，行至门前，受到了叛乱分子的包围，一些石头飞到他的车上，桑颇副司令员正要下车追查这种非法行为，他刚从车门伸出头，就被两颗飞石击中头部，当即昏倒在地。这时有一叛乱分子还持刀赶来，要刺杀桑颇·才旺仁增，正在这紧急的时刻，幸亏他车上的保卫人员极力保护，才迅速地驱车脱离险境。

叛乱分子显然企图通过流血事件来尽量扩大事态的发展。就在这天下午，他们在杀害了帕巴拉堪穷，打伤桑颇副司令员以后，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间，一面由一些叛乱分子裹胁群众“示威游行”，一面在罗布林卡召开了伪人民

代表会议。

流血事件发生后，有些叛乱分子也曾经发生过犹豫，担心这样干下去，公开背叛祖国，最终是要失败的。可是，一些最反动的首要分子威胁他们说：“不要忘记石狮子前面所发生的事情（指打死帕巴拉堪穷）。”反动分子头子功德林扎萨还说：“现在事情已经撕开了，是不能有畏惧心理的。”

五、预制的示威

任何人一眼就可以看穿，一系列活动完全是叛乱分子的预谋。

残暴的叛乱分子们在用马尾拖尸“示众”之后，潜伏在市区内的一些叛乱分子便胁迫和欺骗了大约千把人在拉萨市区“游行”。他们拿着小白旗，一路上呼喊着重内容相同的口号：“西藏独立了！”“汉人撤出去！”“我们胜利了！”“你们有种就出来和我们干！”等等。竭尽挑衅之能事。

人们可以看到，在游行的队伍中，有骑车的，有骑马的，他们前后巡逻，为人们打气壮胆。几个领头的反动分子，沿途作反动讲演，张贴反动标语传单。他们撕毁墙壁上的宣传画，推倒交通岗亭，用石头投掷机关的大门，甚至向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吐口水。真是狂妄不可一世，似乎天下真的变了，似乎末日真的降临人间！

其实，这个“示威游行”没有得到拉萨居民的同情，“游

行”队伍中大多数人没有一点自发性，他们惶恐地跟着队伍前进，喊口号的人只是少数，而且一路上人数愈来愈少。当“游行”队伍进入市中心八廓街一带时，就只剩下一、二百人了。

六，声名狼籍的伪人民代表会议

就在3月10日制造“示威游行”的同时，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召开了伪人民代表会议，公开提出了“西藏独立”问题。

在打死帕巴拉·索朗降措的时候，一些叛乱分子就在人群中叫嚷说：“西藏从今天起独立了，谁不同意就打死谁！”

随后，反动的西藏地方政府便下令要聚集在罗布林卡门前的群众推选“人民代表”，参加伪人民代表会议，据说当场推出了19名“代表”。

当时参加伪人民代表会议的共有100多人，包括全体僧官，一半俗官，三大寺堪布七、八人，另外还有携带长短枪的武装叛乱分子四五十人，这些武装叛匪都是以所谓“人民代表”的名义出席会议的。出席会议的有很多是在“不到不行”的命令下参加的。当天爱国人士阿沛·阿旺晋美就曾突然接到了这样的通知，可是他没有去出席会议。

主持会议的是叛乱头子大喇嘛绒朗色，堪仲土登降秋

(堪仲意为秘书长), 孜本雪苦巴, 孜本凯墨等人。叛乱头子、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在会上煽动说:“军区这次请达赖喇嘛看戏, 未经过噶厦和代理机巧堪布(指噶章),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达赖喇嘛不能去军区。”接着他还说:“关于西藏独立的问题, 我们准备和中央谈判, 谈判情况以后通过‘代表’向全体人民传达。”

当时有一反动分子接着说:“军区有监狱, 不能让达赖喇嘛去, 现在西藏独立了, 达赖喇嘛不能随便到中央去。”

会上的讲话, 同时以扩音器向罗布林布门前“请愿”的人广播了。在“游行”时, 反动分子即喊着口号:“达赖喇嘛不能到军区去! 我们胜利了!”

在这次反动的会议上决定: 公开宣布西藏独立, 与中央决裂, 而且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工作的官员, 从11日起, 一律不准再去办公。会上, 初步提出由孜本雪苦巴、大惹堪穷(达赖近侍机构的秘书)、噶章、索康、凯墨和藏军副司令洛珠格桑等反动分子来领导“西藏独立运动”。

反动分子们还决定加强控制达赖喇嘛, 提出今后达赖喇嘛除上下两宫殿(布达拉宫及罗布林卡)和大昭寺以外, “不能随意走动”。另外, “增添政府人员和人民志愿军”(指叛匪)为警卫军, 驻扎罗布林卡。

反动分子们先开大会, 然后又分小组进行讨论。在这天的会议上, 还提出“代表”去印度领事馆, 通知他们说西藏已宣布“独立”。

伪人民代表会议在西藏早已是臭名远扬了。在1952年，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鲁康娃和罗桑扎西（即鲁康娃·泽旺绕登、本珠仓·洛桑扎西，均为原西藏地方政府代理司伦，意为帮办人员，位在噶伦之上，设于十三世达赖时）等人秘密成立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当时这些反动分子企图组织暴乱，如不成功，便挟持达赖逃往印度。那次阴谋很快地遭到失败，反动分子鲁康娃和罗桑扎西被撤职，鲁康娃后来跑到印度。几年来这个反动组织在表面上被解散，实际上它却一直秘密活动。

1954年达赖喇嘛赴内地后，由反动分子阿乐群则和阿南拉等人出头，再次组织伪人民会议，对外他们称为“敬献会”。达赖喇嘛由内地启程返藏时，这个反动组织即派代表到雅安、昌都、太昭等地欢迎。在完成对达赖喇嘛的敬献、祝愿等“任务”后，号称解散，实际上仍然秘密活动。

1956年春，拉萨发现反动传单，查明即是这个反革命组织在进行阴谋活动，后来反动分子阿乐群则被逮捕，达赖喇嘛亦出示布告宣布解散伪人民代表会议。可是，事实上这个反动组织还是没有解散，而是转入了更加秘密的活动。

这次叛乱，伪人民会议分子成了最活跃的骨干人物。1952年开始组织伪人民代表会议的头子罗桑扎西，在这次叛乱中，伪人民代表及叛军司令等，在三月十八日，曾专门向他“汇报了工作”。罗桑扎西对叛匪们前几日的工作表

示满意，并且作了指示。罗桑扎西是这次叛乱的重要头子之一，这次他遭到了比1952年更加惨重的失败。

七、战争的前夜

三月十日以后一直到战争打响以前，拉萨的叛乱分子一方面策划各种政治阴谋，裹胁群众，蛊惑人心，一方面积极进行军事布署。

据被俘的伪人民代表阿南拉、堪仲（即堪布秘书）土登丹达、衮桑（伪妇女会头子）、洛桑多吉（原中央民族学院藏文教师，此次参加叛乱）等人供称：伪人民代表会议在十日以后连续举行了四五次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们讨论的中心是“西藏独立问题”。他们争论过是“文打”还是“武打”？失败了逃到哪里？怎样取得印度和帝国主义的帮助？联合国能够为他们出些什么力？甚至于出一个布告，拟一个发到外国的电稿，刻一个“西藏独立国人民大会”的印章，也都进行了讨论。召开这些会议时，叛乱分子通知所有到会的人说：“会议重要，不去不行，否则予以逮捕。”到会的人都必须表明政治态度，在各种意见书上签字盖章。他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意见书”来表示“人民的意见”。最近拉萨军管会查获了大批“意见书”，内容极端反动，可是也有些“意见书”显然是在敷衍塞责。

在3月11日的伪人民会议上，曾通过五条杀气腾腾的反动决议，这是一个重要的决议，决议内容是：第一、所

有参加会议的人全部按班、排、连组织起来；第二、16岁到60岁的市民进行登记，全部动员起来，参加作战；第三、三大寺组织先锋队；第四、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和汉人机关工作的藏人，限期在藏历2月2日（即公历3月11日）以前登记“悔过”，过期不收；第五、不来自首的藏族干部，在街上遇到时格杀勿论。

由于达赖喇嘛的反对，3月11日以后，一部分人移到布达拉宫脚下叫做雪的地方召开，而一部分仍然在罗布林卡开会。

在各种会议上，叛乱分子们，力求寻找一些“西藏独立”的“政治资本”，他们召开过几百人的扩大会议，广泛地强迫人们签名参加叛乱。他们还枉费心地起草了西藏与中央“不和”的“十大理由”和“四大理由”以及宣传要点之类的东西。反动分子们企图通过这些杜撰的材料来欺骗群众，笼络人心。可是他们是不大容易达到目的的，例如，由英国一手培养起来长期从事分裂活动的反动头子、西藏的财阀擦绒所起草的反对中央的“十大理由”，竟把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办学校、修公路、办医院、修电厂等藏族人民同声称赞的好事，也说成是坏事，说成是“危害甚大”、“魔手伸入了天堂”等似乎足以值得反对的“理由”。

在伪人民代表会议上，曾经专门讨论了拟发电报给逃到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叛国分子，通知他们“西藏独立国”

已经成立，要求他们呼吁印度政府和联合国等给予叛乱分子以支持。噶厦牛皮船总管、五品官泽登旺秋曾参加过几次会议，他谈到3月12日伪人民代表在雪地方开会时，有人曾提出立即发电报给噶伦堡，叫他们（叛乱分子）向印度呼吁。泽登旺秋说：13日的会议上，他们拟好了电稿，并当场决定派论钦·土登才白堪穷去罗布林卡将电报送叛军司令功德林扎萨审阅，然后送德吉林卡（即印度驻拉萨领事馆）发出。

查获的材料证明，从拉萨的确向噶伦堡发出了密电。在藏历2月7日和8日（即公历3月16和17日）发出的二封密电，是分别以“西藏独立会议”和“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全体大会”的名义，发给逃在印度的西藏叛国分子孜本夏格巴·汪秋德敦转给噶伦堡的反革命组织“西藏幸福事业会”的。这证实在拉萨的确有同指挥西藏叛乱的中心噶伦堡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

从缴获的叛匪文件中，偶然地使人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在拉萨的叛匪，当时自己还没有可供使用的电台。因为从一份在功德林缴获的“向噶厦等的报告记录（行动计划）”中证实说：“我政府（指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也有无线电，是否可以直接（说的是直接而不是间接）发电至噶伦堡？”随后，在这份报告记录的末尾说：“已办。”“无线电的器材不全。”

人们从这份叛匪内部文件中初步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

论：第一、拉萨叛匪的电台当时器材不全，不能使用；第二、拉萨叛乱分子发往噶伦堡的密电，不是叛匪自己的电台发的。

如果这个结论能够成立，那么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拉萨同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叛国分子秘密联系的电台，它究竟是谁的？

八、谁是被叛乱分子寻求“支持”的人？

据伪人民代表分子阿南拉说，3月10日上午，叛国的噶厦政府派了两个官员、六个“人民代表”去印度驻拉萨领事馆寻求对叛乱的支持。印度领事蔡伯尔先生接见了这些叛乱分子。叛乱分子对这位领事说：“我们的人民今天游行了，从今天起我们西藏独立了，我们不再在汉人管辖之下了，汉人如要杀我们，你们要出来作证，我们的独立你承认不承认？”

由于印度同中国的正式外交关系，这位印度领事对于答复叛乱分子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显然是有困难的。不过，他还是坚持说：“你们所谈的问题，我要请示我们的政府才能答复。”

这天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根据参加伪妇女会的分子衮桑说，3月15日，叛乱分子所组织的伪妇女会，凑合了一些妇女，再次去印度领事馆要求答复。是伪妇女会分子噶林厦·却拉（尼姑）带领

前去的。却拉向蔡伯尔说：“西藏是独立的，请将意见转告印度政府的领袖。”

蔡伯尔先生答复说：“关于西藏独立问题事关重大，要请示我们的政府后才能答复。”

对于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作出怎样的“答复”呢？是否应该“答复”呢？蔡伯尔先生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当天，印度领事馆答应要伪妇女会的代表明天（即3月16日）上午10时（即北京时间12时）再去领事馆听候“答复”。

果然，3月16日伪妇女会的代表又准时到达印度领事馆。蔡伯尔先生说：“情况已报告政府，尚未答复。”

为了听候印度政府对“西藏独立”问题的“答复”，伪妇女会的代表在3月18日又去领事馆。据袞桑说，这次她们没有见到蔡伯尔。

由于印驻拉萨领事的答应印政府要对“西藏独立”问题予以“答复”，这样，叛乱分子便连续三四次到印领事馆“请愿”。

叛乱分子要寻求外国人的支持，这就是在此间为许多人所共知的一些公开的情况。

九，反动派是怎样把妇女逼上街头的

伪妇女会是由噶厦出面一手组织起来的。从3月14日

起，大肆活动。反动分子把姑娘、主妇和老太太们赶上街头，强迫他们开会游行。

叛乱分子利用妇女会欺骗迷惑群众。他们制定统一的反动口号，交给她们在街上呼喊，强迫家庭主妇都要开会游行，否则罚银子，打屁股，没收财产，从居住的房屋中赶出去。

3月14日，有三百多妇女接到噶厦的通知，凑集在布达拉宫下开会，另有几百个妇女在印度领事馆附近开会。下午4点多，两处开会的妇女集中一起，有三百多到街上游行，呼喊反动口号。人们看到，这是一个被驱赶的、不情愿的游行队伍，真正喊口号的也只有四五十人，其余的嘴也不动，手也不举。当她们经过我人民法院门口时，有一个机关干部想把这个游行队伍拍下照片，结果，大家纷纷躲到路边，有的用围裙蒙着头，害怕摄入镜头。当时趁着混乱的时刻，多数妇女索性躲入小巷中，趁机走散了。

在以后的几天，因为噶厦用罚款、没收财产等办法逼得紧，到会的人数从几百一直增加到19日的2000多人。这时，人们私下传播：这是噶厦的缓兵之计，等军队准备好以后，这玩艺儿就不需要了。

几位被叛乱分子强迫参加开会游行的家庭主妇对记者说，在那些日子里，她们受到种种威胁，每天提心吊胆，哭哭啼啼，在被逼得没有办法时，她们只得闭着嘴巴跟到街上走一趟。在自治区筹委会机关里有亲友关系的，索性

就搬到亲友那里去躲避。那几天拉萨市民偷偷搬家的竟是如此之多，以致给许多机关造成人满之患。

三个孩子的母亲其美旺姆对记者说：“叛乱分子威胁我们说，凡是给汉人办事的，都要烧掉他们的房子，把老婆孩子都烧死在屋里。”她说：“他们逼着我们妇女到布达拉宫下去开会，男的一个不要，所有妇女包括刚能说话的女孩子，都得去！叛乱分子说，如果不去，在家里搜出来，要没收全部家产。”

其美旺姆是个不到三十岁的活跃的家庭主妇，她曾参加了拉萨市爱国妇女联谊会的业余歌舞团，因为这一件事，她曾日夜担心，害怕遇到叛乱分子的报复。她被迫去开了一次伪妇女会，叛乱分子逼迫她签了一次名，可是她说，她当时根本不知道签名是什么意思。

其美旺姆说：“后来我生病了，要求不去开会，反动分子逼我拿出25两银子，还说我拿汉人的大洋（指参加业余歌舞团），所以不来开会，以此来威胁我。”她同院的一个妇女比她还可怜，那个妇女头一天小产，头发昏，下部还流血不止，可是第二天叛乱分子就强迫她去开会。那位妇女苦苦哀求说：“我的身体实在不行，情愿给50两银子行不行！”可是反动分子不理睬她，威胁说：“噶厦通知了，谁如果不去，屋里的东西要没收。”这位妇女只得浑身发着抖去参加叛乱分子召集的妇女会。

朗杰卓噶也是一个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在拉萨市第二

小学当教员，就为这件事，反动分子威胁她说：“凡是拿汉人钱的，都要象帕巴拉·索朗降措一样的对待！”那些日子，她的丈夫一直躲在外面。

朗杰卓噶被迫参加伪妇女会一次，第二次，她生病不去，叛乱分子说：“第一次参加了游行，口号也喊了，再想不去就不行了！”后来，她被迫参加了到印度领事馆门前“请愿”的活动。她说：那天有好几百人，我听到从印度领事馆传出的话说：“给我们政府的电报已经发出，还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游行队伍就上街游行。

朗杰卓噶看到，叛乱分子在会上恐吓人们：“谁不来开会，就通知他拿银子来，以前没来的，现在有钱当场交，没带钱的回去拿，家里没有要向人借，一次不到50两，一个不能少！”朗杰卓噶说：“就在那次会上，一个藏政府的小官员的妻子，因为四次没有到会，当场被罚了二百两银子。”她说，在这种情况下，后来她只得躲起来了。

回族妇女则利海为躲避叛乱分子的威胁和勒索，曾想搬到人民银行她的亲戚那里，叛乱分子知道后，威胁她说：“谁随便搬家，就没收房子，要象对帕巴拉堪穷一样地处理她！”后来她还是偷偷地搬走了。

妇女们谈起受害经过都哭了。她们说：那时候真象没了太阳，这些叛乱分子应该坚决消灭！

十，叛匪全面进攻 解放军奉命平叛

西藏的叛国分子看到人民解放军一再忍让，他们的头脑发昏了，在军事上作了一个极端错误的估计。他们说：西藏军区驻拉萨的部队和机关人员，总共才不过2000人，还包括家属和小孩在内。他们过高地估计自己，认为叛军的战斗力占极大“优势”，至少在人数上就相当于解放军的三倍多，而且武器库里还有充足的英国造枪械弹药。

根据这样的估计，叛乱分子在3月10日以前，竟肆无忌惮地屡次向人民解放军和地方机关挑衅。今年1月间，人们就发现在布达拉宫东面的一座四层楼房上，安放了两门炮和三挺机枪，方向对准了西藏工委。藏军警察代本还公开对士兵们说：“你们要打仗吗？拉萨有的是仗可打。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武器和弹药，要多少有多少！”

3月10日事件揭开了盖子。他们公开地调兵遣将，进行壮丁登记，准备普遍征兵，武装喇嘛，在各个军事要点，大肆修筑工事，决心要同人民解放军较量。叛匪分子曾经设想：既然有一个“军事优势”，在外国又有帝国主义和印度帮忙，里面一打，外面一叫，解放军就只有撤走，即使拉萨失败了，还有山南，山南失败了，还有个印度。总之，军事上失败了，还有政治，那时告到联合国，总可以捞一把。

基于这种算计，叛军总部订出了作战计划，他们决定：先断绝拉萨四周的公路，割断联系，孤立拉萨，先打下拉萨西郊（那里有十几个无战斗力的机关），然后主力集中市

区，对机关各个击破，最后攻打或者长期围困西藏军区和中共西藏工委。打下拉萨，造成既成事实，便可“独立”了。

3月10日事件发生后，这个计划被加紧执行。在七八天的时间内，叛乱分子公开地、疯狂地进行备战。事情发生的第二天（3月11日），解放军部队就发现，在罗布林卡的叛匪公开地在附近国防公路两侧修筑了大量的工事，布置了机枪和叛匪驻守，企图截断公路交通。为此，当时西藏军区就向噶厦提出了抗议，指出这是叛乱分子严重地破坏国防交通安全的行为，是狂妄的军事挑衅，表示人民解放军不能置之不理。

这个警告没有效果，叛乱分子相反地更加露骨地进行军事布署。他们在罗布林卡附近的药王山制高点修筑炮兵阵地，在罗布林周围修筑了地堡、交通壕，布置了四五道防线，在布达拉山上设置了大批沙袋和地堡，附近有的房屋被拆除修了工事，三大寺的一些武装喇嘛和藏军在那里进入了阵地，大昭寺派了叛匪的“坚定分子”驻守，在小昭寺和功德林，都由叛军的骨干在那里安上了重要据点，三大寺的武装喇嘛，一部分派出加强其他据点，一部分负责控制本寺附近的有利地形，另一部负责堵塞青藏、康藏公路，成为就地切断交通的主要兵力，甚至在靠近我军某部驻地的一个尼姑庙，也都被叛乱分子控制，在那里修筑了进攻人民解放军的据点。这时，拉萨的著名寺庙就已不

成其为“宗教圣地”了，叛乱分子把它们变成了杀气腾腾的战争据点。

寺庙的喇嘛很多是被迫背上武器的。哲蚌寺的贫苦喇嘛因流露反对叛乱的意愿而遭到毒打，大昭寺有的喇嘛被枪杀，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有很多喇嘛公开表示不愿参加。过去反动分子为杀害爱国喇嘛热振活佛，曾派兵攻打过色拉寺。这次叛乱时，这个寺的有些喇嘛说：“藏政府打下的弹痕还在，我们不参加‘藏政府’”。

向“护法神”打卦问卜（如问反对中央的前途如何？是否先破坏飞机场等），也是叛匪军事准备的主要内容之一。此外，还大量散发和出卖“护身符”，欺骗被裹胁分子为他们卖命，说是带着“护身符”，刀枪不入。所谓“护身符”，实际是一个土制的佛龕，有些被欺骗的分子竟为此一符花50两藏银（约合银元四元多）。

拉萨叛匪正在积极准备叛乱时，接到他们在噶伦堡的叛国头子在3月14日发出的秘密指示：要求叛匪大量地到拉萨集中，重点布置在罗布林卡，少部分住布达拉宫，要康匪头子郎加多吉立即分三路进兵，要叛匪破坏青藏公路，迫使我军不能通车，这个指示最后还要求在拉萨搜罗阿飞，并抓年轻漂亮的妇女30名。以上限定在三日内完成（即达赖被劫走的十七日以前）。

3月16日，叛匪突然向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开枪射击。当天上午，叛匪向这个站打37枪，下午四时，又打20多枪，

晚上继续射击。

同一天，叛匪又公然在市区连续砍断12根电线杆，收去600多公尺电线。

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处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功德林和布达拉宫等叛匪据点的半圆形包围中，附近有一个汽油站，是一个极易破坏的场所。它在公路边，这公路是罗布林布同附近山区叛匪联络的要冲，特别是它处在上述四个叛匪据点的咽喉，叛匪感到十分碍眼，为了这些缘故，叛乱分子一直想拔除它，因此肆意地挑衅，站上的建筑物吃了不少冷弹。运输站上的汽油库，更是经常被射击的目标，叛乱分子显然希望用一颗枪弹来引起五百多桶汽油的巨大爆炸。

20凌晨，在拉萨河渡口处响起了叛匪的枪声，瞬息间，在叛匪各个重要据点的上空，信号弹飞舞，全市各处的敌人一齐打枪，西郊的机关普遍遭到射击，接着从药王山、罗布林卡和功德林等处响起了炮声。凌晨三点多，叛匪向青拉站连续发起了三次猛烈冲锋。

20日凌晨3点45分，突然从西、南两面的罗布林卡和药王山、功德林、布达拉宫等处，接连响起了号声，号音未了，四个地方便一齐用密集的炮火向运输站发动进攻。

拂晓6点多，叛匪向青拉站发动第一次冲锋。从罗布林卡钻出六百多人，哇啦哇啦地怪叫着向前跑。青拉站的80多个民兵，奋起还击，十七挺轻机枪和两挺重机枪一齐

开火，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冲锋。不久，他们又发动第二次冲锋，有些匪徒冲向大门前，企图点燃两桶汽油和投过来的十包炸药，结果又被打退。敌人两次失败后，便占领了青拉站旁的拉萨中学，在相距10公尺的地方，发动第三次进攻。在叛匪的激烈炮火中，炊事班长王正明勇敢地冲上前去阻止叛匪前进，结果英勇地牺牲了。最后，在全体的猛烈反击下，叛匪再次溃退。叛乱分子在三次进攻中，向青拉站打了一百零六发炮弹。在三次反击中，青拉站牺牲六人，轻伤三人。牺牲的六人中有驾驶员、炊事员、理发员和家属。一栋六间的办公室，几乎被叛匪的枪炮夷为平地。有两部汽车被打毁，汽油库的500多桶汽油由于职工们事先花很大力气把它们埋在地下，幸而未受损失。

一切迹象表明，叛匪完全是按照预定的计划猖狂叛乱的，青拉站机关民兵将叛匪打退后，在20日上午八时许，盘踞在小昭寺的叛匪开始向拉萨建筑工程处发起进攻。建筑工程处的位置是在通向色拉寺的要道口上，它同小昭寺紧临，叛匪的碉堡伸到建工处院边，最近的只有20公尺。因此，叛匪急于要首先拔掉这个钉子。

当时，约有千名叛匪盘踞小昭寺及附近的建筑物内，而建工处只有一个机关民兵排守卫，实际上同敌人作战的只有20人左右。打响之后，有六七十个叛匪向这个机关发起冲锋，他们强迫一些居民挖破一个墙洞，由此处攻进院里。正在危急中，有3个机关干部勇敢地用手榴弹打退了

叛匪。下午，叛匪用无后坐力炮继续向建工处攻击，一个干部受伤，20多间房屋全部被烧毁。20几个民兵一直坚持了一天两夜，机关的妇女和医务人员，也都参加了战斗，叛匪终于没有拔下这个钉子。

在攻击青拉站和建工处的同时，叛匪还向自治区筹委会外事处、人民医院、气象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邮电局、贸易公司、西藏日报社和新华社西藏分社等机关，普遍发动了进攻，其疯狂达到极点。

在此危急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已忍无可忍，于20日上午十时，奉命出击，坚决平叛。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出击之后，便迅速地攻占了叛匪的一些重要据点。他们在两小时内占领了药王山的敌炮阵地，又在四个小时内神速地攻占了罗布林卡的叛匪大本营。随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又陆续地歼灭了功德林和小昭寺等地的叛匪。此时，叛匪已恐慌万状，22日晨，在布达拉宫和雪地方方的叛匪投降，随后大昭寺的叛匪也缴了枪。市区平叛的战斗，不到两天便全部结束，郊外三大寺的叛匪，除逃散的以外，也表示愿意投降。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接管了这些叛匪的巢穴，对爱国寺庙和爱国喇嘛加以保护，所有叛匪武器予以缴获。叛乱平息了。

战斗结束后，人们看到躺在街上的叛匪尸体，有许多身上携带了大批劫掠的财物。在建工处院内一些康巴匪徒的手指上，戴满了一串串的金银和宝石戒指，他们腰里鼓

鼓囊囊塞满了大批藏钞和银元。这些战后景象，给叛匪的“卫教军”作出了公正恰当的评价。拉萨市居民在22日上午枪声停止后不久，便陆续上街，他们愤怒地唾骂这些残害人民的匪徒。

这就是拉萨平叛的真象。一小撮反动分子企图破坏伟大的中国，好比是蚍蜉撼树，愚蠢之极。西藏叛国集团的幻想破灭了，如果帝国主义还企图继续把赌注押在这些叛匪身上，那是永远不会得逞的，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